

巴马修道院

[法]司汤达 著 郝运 译



LA CHARTREUSE DE PARME

巴马修道院

[法]司汤达 著 郝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tendhal
LA CHARTREUSE DE PARME

本书根据Editions Garnier Frères, Paris,
1949年版本译出

巴 马 修 道 院

〔法〕司汤达 著

郝 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 海 市 印 刷 十 二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375 插页 5 字数 407,000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册

ISBN 7-5327-1896-4/I · 1134

定 价：21.60 元

种比国内价格要高出 1~2 倍，甚至更多。这意味着，中国的粮食价格上涨动力依然强劲。

国内的粮价、菜价、食用油价格的上涨，乃是内因和外因合力推动的必然结果，尤其在国内外价差压力之下，食品低价时代已经过去。

如果您希望过一段时间物价能够回到从前，那么，时间的无情流逝带来的恐怕是一个更无情的结果。货币的贬值趋势将顽强地延续，最后觉醒的人，只会在财富的流逝中，承受痛苦和无奈。

货币贬值，资源品价格必然上涨，而这种上涨并不仅仅体现在商品领域。

不妨对照一下中国 A 股 2005 年年底到 2007 年年底，2008 年年底到 2009 年 7 月，以及 2010 年 6 月到 11 月中旬的走势，无不是以黄金等贵金属、稀土等稀有有色金属和煤炭等传统能源为代表的资源品（包含提升资源价值的技术加工相关品种）的价格走强为基石的。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

这只能说，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在资源类趋势方面达成了某种“默契”。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原理，在通货膨胀方面体现得非常直接和分明。通货膨胀从来都是从量变向质变悄然演化的。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通货膨胀，比起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有时通货膨胀率甚至超过了 1000%。1923 年那次通货膨胀末期，物价水平较两年前上涨了 300 亿倍。即使是购买最基本的物品，也需要数量惊人的货币，买一片面包就得要一手推车的现金。货币贬值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在一天之中，要分好几次向工人支付薪水，而工人也要赶回



统称为上层建筑。

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在联系生产力、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揭示客观经济规律。

三、本章习题

(一) 单项选择题

1. “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的提出者是()。
A. 色诺芬
B. 魁奈
C. 威廉·配第
D. 蒙克莱田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科学成分的基础上创立的。
A. 重商主义
B. 重农主义
C.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D. 凯恩斯主义
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最终建立，是以马克思的伟大著作()的完成为标志。
A.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B.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C. 《资本论》
D. 《哥达纲领批判》
4.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
A. 生产关系
B. 生产力
C. 商品
D. 物质资料生产

5. 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
- A. 劳动过程
 - B. 物质资料生产
 - C. 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
 - D. 精神产品的生产
6. 在社会生产关系中，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是()。
- A. 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问题
 - B.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问题
 - C. 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
 - D. 物质资料生产问题
7. 社会生产过程的决定性环节是()。
- A. 生产
 - B. 分配
 - C. 交换
 - D. 消费
8. 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
- A. 人们的相互关系
 - B. 市场的商品交换
 - C. 资源的有效配置
 - D. 生产资料所有制
9. 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变更的经济规律是()。
- A. 价值规律
 - B. 剩余价值规律
 - C.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
 - D. 节约劳动时间规律
10. 社会生产方式是()。
- A.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 B.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 C. 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家将领到的薪水花出去，以免它变得一文不值。没有人愿意持有货币，通过货币的交易越来越少，物物交换重新出现并盛行起来。^⑦

德国一则旧时的报道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荒诞：一个家庭主妇装了满满一手推车钱（仅够买一点食品）去买点吃的，一个小偷趁她不注意，把一车钱倒在地上，推着车子飞快地跑了。车子比钱价值高得多、稳定得多也可靠得多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流通货币每月平均增加12000%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价格上涨更甚，每月上涨近20000%。^⑧

您也许会觉得这些例子有些极端，毕竟它们是在社会动荡时期发生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货币的贬值并非由于社会动荡引起，确切地说，更多的情形是货币贬值过快、货币体系出现系统性隐患引发了社会动荡。很多货币快速贬值的隐患在社会动荡以前就已经埋下，只是人们浑然不觉而已。当危机意识成为群体性反应的时候，货币的真实购买力就会突然呈现出来，犹如一张美丽的画皮在刹那间脱落而露出狰狞的面容，令人猝不及防。

换句话说，人们感受到的是纸币突然间跳水般地贬值，实际上货币的超发早就开始对应着急剧缩水后的购买力，只是暂时被遮掩了而已。

苏联时期，1卢布兑换2美元还多，但解体后，变成了40000卢布兑换1美元（这里的卢布指的是旧卢布）。这种变化虽然表面上看仿佛是瞬间完成，实际上是早已铸就。

人们被货币欺骗

19世纪中叶英国一位名叫格莱顿的议员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研究货币本质中受到欺骗的人，比谈恋爱受欺骗的人还要多。”

货币为何有这么大的欺骗性？

我们有必要从一些基本的常识入手，来更清楚地讲明这一问题。

马克思认为，实物是最早的货币。在中国，牲畜币是最早的实物货币。

研读史料带给我的最大感受是，货币从最初产生所具备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实用，且“不容易大量获取”。^⑨

这是货币功能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必须依托的基础。一旦作为货币的商品过滥，就会丧失货币的功能，遭到抛弃。

货币必须“不容易大量获取”才能确保其信誉度不减，确保其购买力不缩水。

这种特性贯穿了纸币问世以前的整个货币历史——在纸币之后，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权，通过权力使货币对社会上的人而言，仍然是“不容易大量获取”。

在金属货币时代，由铸币价值与其所包含的金属价值保持一致，出现了“自由铸造”的现象。比如，前资本主义的西方，公民有权把经法令确定的货币金属送到国家的造币厂铸成铸币，造币厂代公民铸造，或不收取费用，或收取很低的熔炼打造成本；公民也有权把铸币熔化，但严格禁止私自铸造。^⑩

由于铸币价值与其所包含的金属价值一致，政府几乎没有制造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甚至还出现了政府铸币动力不足的问题。

在金属货币时代，政府常常会非常“痛苦”。清代从19世纪初起，由于鸦片走私日益严重，白银大量外流，国内开始出现银荒，银价上升。清政府铸钱是按白银核算成本的，银价上升，必然使铸钱成本增加。银贵钱贱对政府财政造成了难以承受的铸钱亏损。

据史料记载，雍正年间铸造重一钱四分之钱，仅宝泉、宝源二京局每年即亏损白银30万两。制钱的市场价格与其价值严重背离，还导致了制钱被大量私销取铜的问题，使得流通领域里制钱供应量严重不足，“流通日少”，因此，当时的奏章中，屡屡提及“钱荒”问题。^⑪

金属的特性，竟然使得这种货币时代的政府，在某些阶段连铸钱的动力也丧失了，出现了“钱荒”，这种现象在今天这个纸币满天飞的时代，看起来是多么遥远！

开采贵金属的工具和技术落后，贵金属的生产数量比较稳定，限制了当局随便发行货币图利的机会。但是，统治者最终还是找到了简单的让货币贬值的方法：一种是让金属币所含金属小于它所代表的币值；另一种是在铸币中加进其他贱金属，导致货币“成色”下降而币值不变。作为货币发行的绝对主导者，在这方面，政府并不缺智慧。

清政府如何解决“钱荒”问题呢？

方法是铸造大钱。1853年3月，清政府批准铸造币面价值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的大钱。比如，当千大钱，扣除成本，净盈利约919文，为成本的11.3倍。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变相掠夺民众的财富，缓解财政危机。钱价暴跌的结果是物价飞涨，咸丰十年的物价较之发行大钱、票钞以前，茶叶上涨5倍，猪肉上涨6倍。第二年夏、秋间，物价再次飞涨。^⑫

国外也有类似的例子。

的出现让政府获得了一种更为廉价的诈骗人民的方法。”^⑩

尽管货币的发行往往被披上拯救危机等冠冕堂皇的外衣，但实际上，货币的滥发不仅拯救不了危机，反而产生出了更多的问题。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承认：“过去20年中，如果有哪些货币政策被证明是有效的话，那就是通货膨胀对经济造成的长期伤害将超越其对经济的短期拉动作用。”^⑪

货币垄断之弊

那么，为什么货币的滥发越来越严重了呢？这种现象背后的动力在哪里？

哈耶克认为，由于政府垄断了货币的发行，必然存在滥发货币的冲动。过多的货币会使正常的市场经济价格体系发生紊乱，造成经济的周期波动。解决这一周期的根本办法是打破政府的货币垄断地位，允许私人机构发行货币，让货币像一般商品一样进行竞争，最后币值最稳定的一种或几种货币会存活下来，成为日常经济中的通用货币。处在竞争环境下的货币面临着随时被淘汰的危机，所以会把币值稳定作为第一目标，货币中性得以实现，经济不再受到货币的外在冲击，周期性的波动也会永远成为历史。^⑫

看起来这是多么理想化的一种境界！但是，在历史上，这种理想化的状态的确存在过。

在美国工业化大规模展开之前，由政府做后盾的美元只是当时美国各州、银行、公司、商人和采矿企业所发行的多达8000种的货币之一。1863年，美国政府才强制推行了货币的标准化。1871年，日本的明治维新使得日元成为日本的统一货币；德国马克在德国境内的统一发生在1873年。这些年表至少说明一点，货币统一并不是自古以来的常见规律，没有经受长时段历史的检验。^⑬

美国投资家威廉·贝克也认为，如果货币发行存在竞争，次贷危机或能避免。他指出：“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如果允许更多的银行（比如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发行纸币同其他银行竞争，并通过清算银行进行定期赎回，就会比今天更及时地发现问题。”^⑭

当下，在电子货币时代，的确有些货币的“形态”开始出现。目前已有大量交易以虚拟的电子货币为媒介而成交。我们的信用卡、各类贵宾消费卡、飞机里程积分都可以部分充当货币的职能，多种多样的货币背后有着多种多样的后盾，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向国家垄断货币发起了挑战。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恐怕很难判断那么多货

币或者货币形式孰优孰劣，但是市场终究会告诉我们答案。能在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商品或者货币，就是好的。^②

当然，就现状而言，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接受货币的非国家化理论，人们只能无奈地接受货币贬值的现实。

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货币的大量过剩。

第二节

吸纳超发货币的海绵

如果不明白货币的超发和吸纳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弄懂中国楼市和股市的趋势。可以说，两者的大趋势无不与货币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果货币是水，那么，海绵就好比是货币的归属地。超发货币必须有合适的归属地吸纳它，以寻求某种平衡，否则，就可能在某些方面泛滥成灾。最直观的一个现象是：当海绵无法吸纳多余的水流时，就会溢出来，货币也就会进入贬值的轨道。

这一点，不因地域或国家的不同而有太大区别。

汹涌的货币寻找“海绵”

从1997年以来，全球基础货币（全球流动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球的生产增长速度。2002年以后，全球货币增长率持续上涨，持续高于10%，甚至达到近25%，但世界GDP的增长率一直在2%~5%之间，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巨额的货币资金必然要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猎取利润对象。从已经破灭的美国新经济泡沫、网络泡沫、股市泡沫，到房地产泡沫，从投机世界石油到投机世界黄金、贵金属甚至森林资源，全球过剩资金一刻不停地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导致各个被投机的商品出现了历史上从未出现的价格走势怪现象。^③

而且，这种状况无法从根本加以解决。

英国学者希勒尔·蒂克延认为：今天有大量过剩资本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这导致资产价格膨胀和各种金融泡沫。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危机重重，因此，它需要一种新的策略克服危机，但仍然未找到。^④

全世界凡是货币超发的国家，都在拼命为货币找出路——只有吸纳掉这些货币，

译 本 序

《巴马修道院》是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在一八三九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是继《阿尔芒斯》（一八二七年发表）与《红与黑》（一八三〇年出版）之后司汤达的第三部重要作品。

司汤达是玛丽－亨利·贝尔的笔名。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国南方的一个名叫格勒诺布尔的城市里。要不是他在生前用司汤达的笔名写下了《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和未完成的《吕西安·娄凡》等在世界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作品，尽管他当过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需官，并且有过多年的外交官生涯，现在不见得有人还会记得他的名字吧。一八四〇年十月，贝尔为了《巴马修道院》在给《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的复信中曾经说过：“我想，五十年后，某一文学补缀家发表片段拙作，也许会以不矫揉造作和真实而为人悦读吧”；他还在信上说：“一百年后，谁还说起维莱尔先生、马尔蒂雅先生？即使达莱朗先生，也无能为力，除非他留下一部《见闻录》，而且还要真好才成。”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具有充分的自信，而对那些显赫一时，然而无所作为的显宦却是十分轻视的。

小贝尔生在一个律师家庭里。在他七岁的时候，他母亲就离开尘世。小贝尔的父亲舍吕班·贝尔是个敬神的、敌视新思想和反对革命的有产者。他在丧妻以后续娶了他的小姨，那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专横的女人。小贝尔从小被交给一个耶稣会神

父抚养，但是无论是那个神父还是他的父亲和后母，都不能对他的思想有所影响。恰恰相反，他对他们始终毫无好感。第一个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某些进步思想的可能是他的外祖父甘尼永大夫，一个伏尔泰的信徒。司汤达后来在回忆时说：“实际上，我完全是由我那可敬爱的外祖父亨利·甘尼永把我教养成人的。”一七八九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当时只有六岁的贝尔对每一条从巴黎传来的消息都感到心醉。他怀着兴奋的心情目送共和国士兵沿着格勒内特广场经过他家的门口。他听到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时候，是兴高采烈的。在“恐怖时期”，他那个反动的父亲不得不躲藏起来，但小贝尔却为自己家庭的敌人的胜利而祈祷。他后来在回忆时说：“我缝了一面小小的三色旗，在共和党人胜利的那些日子里，我就独自在我们那所大住宅的空房间里举着它。当我的旗子被撕毁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殉国的烈士一样。我酷爱自由……当时有过两三句箴言，是我到处都在写的；这些话常常使我感动得落泪。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是：‘不自由，毋宁死’。”小贝尔由于对他反动的家庭深恶痛绝，站到了革命这一方面。从此，他就以雅各宾党人自居。

一七九六年，贝尔进入格勒诺布尔的中心学校求学。这类学校是在革命年代建立起来的，存在的时间很短，从一七九五年到一八〇二年。它的宗旨是培养真正的爱国者、有思想的人才和干练的专家。学校的主要课程是数学、力学和物理等自然科学，还有逻辑学、法学和历史等。教师大多是启蒙运动思想的拥护者，也经常用这种思想来教育学生。在学校里，贝尔非常用心地跟着教师格罗学习数学。他热爱数学的无可争辩的精确性及其论证的真实性；这种对于精确性和真实性的爱好，后来成为他

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一七九九年，贝尔在中心学校毕业，到巴黎去准备上专门培养军事技术人员和炮兵军官的综合工科学校。但是在次年，当时他十七岁，他来到日内瓦，虽然从未学过骑术，却跨上一匹马，冲过阿尔卑斯山，越过圣贝纳德山，在波拿巴经过后两天追上了远征军。他在远征军中经历了马伦哥战役，以后又在第六骑兵团当中士，不久升任少尉，担任密旭将军的副官。他来到米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的艺术品和拉·斯卡拉歌剧院里的出色的歌剧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一八〇一年十二月，亨利·贝尔脱离部队，定居巴黎。他在昂纪维里大街的六层楼上勤奋地钻研唯物主义的哲学和他心爱的文学作品，同时学习古希腊语和英语。爱尔维修、孔狄亚克、卡巴尼斯、蒙田、拉布吕叶、卢梭、阿尔菲爱里和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对他的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卢梭浮夸的文体很快地使他感到不满。他对矫揉造作是无法容忍的。

一八〇六年，他再度回到当时在德国的波拿巴皇帝身边，在不伦瑞克当了皇室领地的总管。一八一〇年他在巴黎当政务院参事，不久又当皇室器物总监。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波拿巴远征俄罗斯。贝尔也参加了这次战争。他亲眼目睹了莫斯科的熊熊烈火，最后他跟随法国部队一起仓皇撤退。从此他就脱离了军界。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重登皇位时，他没有再去投奔他。在《拉辛和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中，他对波拿巴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个伟人有他敢作敢为的气魄；他成功了；但是由于追慕表面的荣华和富丽的宫廷生活，他欺骗了民族，他自己也垮了台。……民族犯了错误，伟人自己也犯了错误。”作为一个雅各宾党人，他谴责拿破仑的独裁

政治，谴责他从厄尔巴岛归来后不该赐封贵族，沉湎于逸乐，抛弃公正的、深得民心的理想。但是贝尔对拿破仑始终保持着敬仰的心情，因为他明白拿破仑保全了某些革命成果，虽然这些成果有利于大资产阶级，但是比起革命以前的社会制度来终究有所进步。

拿破仑失败以后，贝尔出于对音乐和艺术的爱好，从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二一年，一直侨居在意大利，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米兰，只有在一八一七年，他曾经到巴黎、伦敦和格勒诺布尔去过一次。意大利人民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奥地利政府在它统治下的意大利北部建立了最严酷的警察制度。烧炭党人为了摆脱外国奴役和统一意大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贝尔不但同情那些革命者的斗争，而且同其中一些人如贡法洛尼里、蒙蒂、贝尔歇和贝利柯等交上朋友。他一直受到奥地利警察的监视，而且终于在一八二一年被作为一个烧炭党人驱逐出境。意大利的革命风暴始终在他的胸中激荡。明媚的南欧阳光对他永远是一个温暖的回忆。多年以后，在中篇小说《伐妮娜·伐尼尼》中，他塑造了一个为了祖国利益而牺牲个人幸福的烧炭党人比埃特洛的高尚形象。在《红与黑》中他描绘了流亡在巴黎的烧炭党人阿尔塔米拉伯爵。侨居期间，贝尔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作品《维也纳来的书简》于一八一四年问世。一八一七年他出版了《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和《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斯泰斯的生平》。这些著作他都是用笔名发表的。在意大利贝尔好用假名，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不得不使用一些手段来对付严密的警察统治。“司汤达”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上。后来，他选中它作为唯一的笔名，在其他的著作上也都一律改用了这个名字。

一八二一年到一八三〇年他住在巴黎期间，经常在画家兼文学批评家艾继安纳·德莱克吕士家里出入，那里聚集着一批反对王政复辟的文人如保尔-路易·库里耶、小安贝、路易·维太和梅里美等。他们除了讨论文学上的问题外，还讨论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批评复辟政权的各种措施。

一八二二年他出版了《论爱情》。他根据孟德斯鸠论气候的学说、爱尔维修关于人类有权享受幸福的理论、孔狄亚克和卡巴尼斯论感觉的学说建立了爱情论，但是这本书并未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十一年中只售出七本。不过一八二三年出版的《罗西尼生平》却获得成功。他的文学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分在同年问世。第二部分出版于一八二五年，是对法兰西学院院士奥惹的答辩。他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见解，远不是他的同时代人所能全部理解的。他提出莎士比亚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来和拉辛相抗，主张必须扬弃古典悲剧，也即代表君主政体的伟大的十七世纪的悲剧，而用他所说的“散文体的悲剧”来代替它。在他看来，“……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他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而古典主义者则是那些在他们死了百年以后惯于去模仿他们，而不去睁开眼睛观察和模拟自然的人。”他对浪漫主义这个名词的解释，实质上正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他对古典主义的因袭模仿、矫揉造作的抨击，实质上是对专制的君主制度的批判。事实上，尽管他举出拉辛作为古典主义的代表，他倒并不反对拉辛本人，也不反对高乃依和莫里哀等伟大作家。他反对的只是那些十九世纪的低能的模仿者，因为他们死守着美学上的陈规不放，盲目模仿先人的作品，完全是脱离当前的现实。同时，他还反对消极的浪漫主义，对那些“探讨‘富于梦幻的风格’、‘灵魂的秘密’”的诗人们（其中有同他论战过的拉马丁）

都嗤之以鼻，还是一八〇二年在骑兵团里当军官的时候他就曾为了嘲笑“森林的模糊的树梢”，差一点同夏多布里安的崇拜者决斗。总之，司汤达所谓的“模拟自然”，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反映现实”。凡是脱离现实的作品，不管是古典主义的或是消极的浪漫主义的，他都容忍不了。他直率地指出：“要想模仿这个伟大的人物（指莎士比亚），就应该去研究怎样观察我们周围的人们。”贝尔用司汤达发表的几部伟大的作品《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和未完成的《吕西安·娄凡》等是实现了这个原则的，不过不是用戏剧的形式，而是用小说。

司汤达的头一部小说《阿尔芒斯》在一八二七年出版，当时并未引起读者的注意，甚至还受到他自己的朋友们如梅里美等的批评。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他在序言中坦率地承认这部小说“讽刺地描写了工业家和特权阶级的人们”。这位雅各宾党的政治观点始终贯穿在他的著作中。他从来没有对贵族和资产阶级抱有好感，恰恰相反，他“总是极其鄙视资产阶级，好像出于本能似的”。他在这部小说中描绘了一幅法国王政复辟时期贵族生活的阴暗的图画，刻划了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一对不安于现实的、热情磅礴的青年奥克塔斯和阿尔达斯的爱情和悲惨的结局。

一八二七年法国伊塞尔省勃朗格地方发生了一件杀人案。一个年轻的家庭教师同他的女主人秘密相爱，后来把她杀死了。司汤达在《司法公报》上看到这个案件后，开始写一部名叫《于连》的小说。一八二九年七月他为了完成《罗马漫游》，暂时把那部小说搁下，直到一八三〇年初才开始续写，同年完成并且出版。这就是《红与黑》。有人说，红象征着革命，黑象征着教会。也有人说，红象征着法国的红军服，黑象征着教士的黑袍。因为

在王政复辟时期平民子弟已经没有资格投身行伍，立功沙场，只得穿上黑袍，利用教会这条途径来谋取个人的前途。但是，也不妨说，红象征着热情，而黑象征着阴谋。《红与黑》是一部交织着惊心动魄的热情和阴谋的书。作者通过主人公于连·索雷尔这样一个不甘心于随俗沉浮、虚度一生的平民子弟的典型形象，给我们画出了一幅王政复辟时期的精确的画卷：保皇党人的秘密会议（从参加会议的德·内瓦尔身上我们不难看出查理十世的宠臣、内阁总理波林尼雅克的形象），教会里的假仁假义的生活，于连在伦敦和美因兹之间冒着生命危险的奔波等场面，揭露了当时上层社会的丑恶的真相。在黑沉沉的查理十世时代的背景前，于连带着轻蔑和挑战的神情屹立着，控诉贵族、有产者和教士们的种种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假仁假义的罪恶勾当。这位雅各宾党人凭着他伟大的艺术才能把一条社会新闻变成一部政治小说，无论是从其思想性还是从其艺术性来说，不愧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后，司汤达被任命为法国驻的里雅斯特领事，但由于奥地利政府的反对，不久他被改任为驻契维塔－维基里领事。这地方是教皇管辖的一个小港口，离罗马很近。他感到在那里“沉闷得像一场瘟疫”，他几乎被“闷成傻瓜，然后闷死”。从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三三年他写作《自我主义者的回忆》和《亨利·布律拉的一生》，两书都没有完成。一八三三年他开始写《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一直写到一八三四年，一八三六年曾作了些修改，但是也没有写完。一八五五年司汤达的表弟高隆在作者身后发表了这部小说的前十七章，书名叫《绿衣猎人》。此书在以后的年月中数经司汤达的研究者校订，始成定本，共六十八章。尽管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仍